

博士文苑

郝润华
著

《钱注杜诗》 与诗史互证方法

黄山书社

《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

郝润华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郝润华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0. 12

ISBN7-80630-562-9

I. 钱… II. 郝… III. ①杜诗—注释—文学研究
②诗歌史—研究方法—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227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45 字数: 175 千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序

周勋初

润华的《〈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即将出版,索序于余,因有所成,略叙浅见如下:

杜诗的注释已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人称“杜诗学”。此“学”经久不衰。自宋代起,即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又兴起了注杜的高潮,产生了好几种名著,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至今还拥有广大读者。近代注杜的著作仍层出不穷,因为杜诗的内涵太丰富了,研究者不时推出新见,随之也就会有吸收名家新见的注本出现。

但综观古往今来的杜诗注本,若以其影响之大而言,还应首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这是因为钱氏建立了一种寓研究于注释的方法,除用于注释杜诗外,推而广之,还可用于其他人的诗歌,如李商隐等,可见这种方法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杜甫的诗歌,当时即有诗史之称。因为他身处大唐天下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诗人身经离乱,饱经忧患,出之以吟咏,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他用敏锐的目光观察政治的得失,用深沉的感情关怀着广大人民的欢乐与痛苦,用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将之化为千百首诗歌,记录下了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情景,以此抒发他的爱国热情和民胞物与的胸怀。杜诗之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用文学手法反映了唐代的历史。诗歌是用精炼的语言构成的,对于叙及的史实来说,时移势改,旁人难得明白,后人在理解时更多困难。这就说有待于注者依据史籍而加以阐发,或作必要的补正。宋代黄希、黄鹤父子名其著作作为《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就可解

为,他们的着眼之点在于杜甫诗歌与当时历史的相互证发。

这种注解诗歌的方法,后人称之为“诗史互证”。应该说,古人早就使用过这种方法。即以先秦而言,人们讨论《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时,或用史实说明某一些诗的由来,如前人注释《诗经》时,每引《左传》隐公三年卫人同情庄姜而赋《硕人》,即是以史证诗的做法;而杜诗《秋兴》中有句云“匡衡抗疏功名薄”,事见《汉书·匡衡传》,言其引《国风》而指陈春秋时诸侯朝政之得失,则是可以作为以诗证史的例证。由此可见,诗史互证的方法可谓古已有之。

孟子论诗,一则曰知人论世,一则曰以意逆志。前者用于释诗,也就是“以史证诗”。因为诗人总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有所感触而发之于吟咏,读者如欲确切地把握这诗的用意,就得了解这一诗篇的历史背景,努力复原产生此诗的特定环境。但诗人形诸笔墨时,还受外部各种条件的影响,或不便明言,或不愿明言,他们表达时还有一个独特个性的问题,注释者得注意诗人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他们必须“以意逆志”,而不为某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这样才能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

后代叙事性的诗歌大量产生,特别是当杜诗荣膺“诗史”的桂冠之后,处在千家注杜的盛况之下,人们才能较为明确地去采用和掌握这一方法。钱谦益身处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本人又有以诗存史的愿望,后因与朱鹤龄发生两种注释思想的冲突,遂在杜诗的注释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就发现前人对诗史互证的方法有所运用,但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时见偏差。他在《注杜诗略例》中曾举出八种常见的弊病,内如伪造故事、颠倒事实等,可见有的注家态度很不严肃,实际上在以史乱诗。钱谦益要以一种新的著作树立典范,肃清前此的不良学风。

钱氏总结前人注杜的得失时,也涉及到了诗史互证的问题,云是“黄鹤以考定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可见“考订史鉴”之余,还应识其“指要”,这就说明注诗的目的还在把握

诗人的心意。

这里可举钱氏最为自负的几首诗来加以探讨。他在《草堂诗笺序》中假借钱遵王之口曰：“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他在《入朝》、《诸将》的笺注中发表的意见，后人大都表示赞同，而在《玄元皇帝庙》、《洗兵马》等诗的笺注中发表的意见，则引起了不少争议，其中又以《洗兵马》一诗所引发的争议为多。

钱谦益以为：“《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潘耒则起而力斥，云是：“《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实之？”后人起而驳之者尚多，以为《洗兵马》的主旨是歌颂唐帝国的中兴，字里行间虽有抑扬之意，但作品中的情绪还是高昂的，决非“呜呼痛哉”的绝望腔调。大家认为钱氏之病在刻意求深，穿凿过甚。

但钱谦益之所以自称“凿开鸿蒙”，当是以为发掘出了这段历史的隐含义。按杜诗《寄裴施州》下，钱氏考裴冕之仕履曰：“史称自施移澧，[裴冕]碑不详其后先，以公诗考之，冕盖久于施州，当是自澧移施也。史于移官先后，如高适彭、蜀，严武巴、绵之类，每多错误，皆当据公诗考正之。”《钱注杜诗》在个别史实的考证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贯穿此书的主要线索，也是钱氏最为得意而特别强调的地方，则在抉发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杜甫在诗中多处表达了对此事的愤慨，不满于肃宗的有失子道。《洗兵马》一诗的争论焦点就在杜甫诗中究竟有没有这层寓意。潘耒认为肃宗的失尽子道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杜甫作此诗时，肃宗还未有此恶行，其他各家则认为杜甫对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已有所感，但《洗兵马》的主要精神则是歌颂，而非贬斥。可见诗道精微，各家虽然都在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而在以意逆志之时，对诗人情绪与手

法的把握上则每见仁见智,从而产生了很多分歧的意见。

按诗人常用比兴的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后人逆探诗人用意,因无确切无疑的轨迹可循,常是得出不同的结论。杜甫《杜鹃行》等诗歌,后人大都以为即在隐射玄宗、肃宗父子之失和,这或许接近事实,但这里也只能用“或许”二字,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诗歌必然是咏唐代皇室中事。而像《洗兵马》等诗,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的手法,照例不该发生多大分歧,只是后人又说这类诗歌“似颂实讽”、“似颂实讥”,“似颂实刺”,……因为古时即有皮里阳秋之说,注释诗歌的人自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在“知人论世”之时还应“以意逆志”,而发掘诗人隐微的心意。

后人指责钱谦益过为穿凿,是说他在观察问题时求之过深,失掉了分寸感,甚至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可见他在形成和完善这一诗史互证的方法时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在使用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地去适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却在以史证诗或以诗证史,然因各人态度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如果有人品评古人时怀有更多的私意,也就会离事实更远。有的研究者指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评杜甫时,就像是“文化大革命”中办专案似的,洗垢索瘢,肆意臧否,书中认为玄宗、肃宗爷子形成了两党,杜甫与高适分属两党而有矛盾,倒像是“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两派群众组织似的。这样的研究工作,距离诗史互证的要求也就更远了。

这就说明,人们即使采用了诗史互证的方法,还有一个基本态度问题得首先解决。从主观上说,不能存私意和偏见,应该宅心仁厚,对古人抱理解的同情,从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和每一首诗。

总结上言,似可得出下述结论:

前人注杜,虽名著甚多,而以钱谦益的贡献为大。因为他将古来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诗史互证的体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润华以此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归纳和阐发,并对这种方法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这样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帮助后来的注释者和研究人员更自觉地去把握这一重要的传统方法。

后人为古人的诗文作注释,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即以诗史互证方法而言,即要求对诗歌的背景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还要求从事此道的人客观而公正地对待研究对象,不陷于穿凿和武断,敏锐地直探诗人的内心世界。这样也就牵涉到了研究者的品性问题。润华为人厚道,分析问题时有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致,所以她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判断,大都平实可信。

润华曾从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教授学习史学,得硕士学位;后来南京大学,从卞孝萱教授进修,最后在我和莫砺锋教授的指导下得博士学位。我等治学,都主张文史兼通,润华在这样的环境中受教,自然会受到这种学风的浸润。因此她曾提出史家的褒贬之说与诗人的“比兴”、“美刺”手法相通,即可证其对文史之学玩味有得。而她又成长于学术界注重方法论的80年代和90年代,于是在学习的最后阶段,选择《钱注杜诗》为研究对象,既显示出她出身于文献学专业的个人特点,又可看出她向理论方面寻求发展的趋势,因此,这一著作既体现出了她成长的轨迹,也体现出了她自强不息不断突破的奋斗精神。

我忝为她的老师,看到她经过不懈努力而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因而发表个人的一些感想如上,是为序。

2000年10月于
南京大学

前 言

杜诗的解释自宋代以来盛行不衰,到明代已号称“千家注杜”,若论其集大成者,则首推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所写的《序》中说道:

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馀悲,悄乎有馀思也。……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而非感凭臆见为揣测也。(《杜诗详注》卷首)

仇氏于杜诗的特质,首先断定其为“诗史”,即杜诗反映了时代现实,诗人对时事寄托了讽谕的情志。“诗史”成为解释诗歌的一个先设观念,在这个先设观念的指导下,注者选择一套“知人论世”的诗歌解释方法。然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重点在于对前人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并未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倒是明末清

初的钱谦益成了这一研究领域中“诗史”研究方法的先驱。

明清两代杜诗注本层出不穷,在今人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中,仅“全集校刊笺注类”就录有清人注本 27 种,还远非清人注杜之全部。在明清人的注本中,《钱注杜诗》是重要的一种。

《钱注杜诗》二十卷,钱谦益撰。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绛云老人等,常熟(今属江苏)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享年八十三岁。万历中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隶东林党。崇祯元年(1628),官礼部侍郎,后因与温体仁争阁臣事削籍还乡。李自成陷京后,福王立于南京,由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清顺治三年(1646),多铎南征,钱氏迎降,授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修明史馆正总裁,钱氏副之。是时,钱氏声名远播,却未得到清廷的重用,于是钱氏称疾乞归。顺治五年(1648),黄毓祺反清起义失败,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钱氏坐与交通罪,被捕入狱,经家人多方奔走辩释,总督马国柱判定钱谦益与黄毓祺素不相识,钱氏才得以放还。归乡后钱氏唯以著述、佛事为业。他反省思过,痛悔降清之举,并积极投身反清活动,如策反总兵马进宝、并与郑成功遥相联系,企图响应。综观钱氏一生,其思想感情十分复杂,明显随时代环境而变化。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中论及钱谦益时说:“钱谦益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可谓平心之论。

《钱注杜诗》二十卷是钱谦益晚年心力所注。钱氏从明崇祯六年(1633)开始,到清康熙二年(1663)去世前一年才完成全书的笺注,历时三十余年之久,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心血。

细究《钱注杜诗》内容,则与其它杜诗注本不同,钱氏并未对每首杜诗一一作注,而是对有特殊体会和感想的作品进行重点注释。其特点乃在于以唐代史事与杜甫诗歌互相参证,考察杜甫所处之社会环境,深刻体会杜甫思想之微妙变化,澄清史实,阐明诗意。

钱氏注杜所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建立在中国古代诗史关系之上,属于传统的诗歌笺释方法,这种方法从开始到确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钱谦益以此取得了成功,现代学者继续发展和开拓这种方法,使之发扬光大。

对于《钱注杜诗》的价值,自来称赞者大有人在,如史学家陈寅恪在其《柳如是别传》之第五章《复明运动》中说:

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

不过,对此贬责者也不乏其人,如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前言》中认为:

事事征实,不免臆测。

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它们的着眼点都在于《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方法,即诗史互证方法。因而,对诗史互证方法的探讨即显得十分必要。

诗史互证方法包括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两方面。在古代诗歌研究中,以史证诗的传统由来已久,如研究诗人的创作背景及诗歌的创作年代,这种“知人论世”的观念成为古代人文研究中的优良传统。其实“知人论世”即是以史证诗,这种方法在汉代即已被广泛运用,而以诗证史的诗歌注解传统却相对来说建立得较晚,因为以诗证史是通过发掘诗歌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借以说明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和细节。这种方法是伴随着注释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中国古代从《诗经》出现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对《诗经》的注释始终是经疏方式在起主导作用,到魏晋时代因为赋的兴盛,赋注受到重视,但内容不外是对字音、字义、名物、地理等的训诂,直

到南朝才真正出现了重在探求诗旨的注释方式。《文选》李善注所引的阮籍《咏怀诗》颜延之与沈约注,已完全摆脱了博物类事的赋注方式,是最早将诗歌与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的诗歌注释。然而,伴随着这种托讽兴奇的诗歌创作手法,诗歌注解中出现的钩深抉隐、寻求寄托的方法并不合于南朝至唐代的文学研究风气。宋代以降,才真正形成了钩沉史事、抉发诗歌深意的注释风气。

这种方法的运用是以杜甫“诗史”之说为根据的,宋人誉杜诗直陈时事为“诗史”。他们注杜的特点是将杜诗与杜甫本人生平及其时代相结合,重视与诗歌有关材料的阐发,以“比兴”说诗之法抉发杜诗中的寄托。这以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与黄希、黄鹤父子的《补注杜工部诗史》为最典型。显然,宋人解释诗歌的方式较前人有很大突破,但是,由于受儒家“诗教”观的影响,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对杜诗常以自己的意志进行曲解,离开诗歌的艺术特质,过分夸大诗歌的社会功用,所以穿凿之处甚多。到了明末清初,钱谦益本着还原杜诗的目的,对杜诗重新诠释,他运用的方法,一方面是对宋人注释方法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与清初“经世致用”思想及讲求实学的风气有关。钱谦益将考证诗歌本事与阐释、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相结合,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既体现了时代学术风气,又开创了清代诗歌诠释方法的新途径。所以,《钱注杜诗》的产生可以说是诗史互证方法的正式确立。

钱注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字词及典故注释;另一部分是笺释诗意,以考证诗歌与史实间的联系为主,充分体现了诗史互证特色。钱注的价值主要在第二部分,以史实探揣诗人心迹,阐明诗歌旨意,同时也据杜诗探寻唐代史实,将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有机地结合起来。钱氏的结论大部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钱注的实证方法也有因求之过深而失于穿凿之处,比如说他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关系问题即求之太过,略嫌牵强,这主要集中在对《洗兵马》一诗的笺注中。对于这首诗,注杜诸家多认为其主旨是歌颂

唐帝国中兴的局面,如浦起龙所说是“忻喜愿望之词”(《读杜心解》卷二),独钱谦益认为:

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注杜诗》卷二)

未免求之太过,但钱氏看出此诗中隐含的讽刺意味还是独具慧眼的。关于《钱注杜诗》的创作动机,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钱氏借注杜诗来掩盖其降清举止,实际上,钱氏注杜与其降清行为并无多少关系。钱谦益晚年痛悔过失,较常人具有更为复杂的心态和思想,所以他选定杜诗作为研究对象,表达其对明朝的思念之情。

《钱注杜诗》的产生,不仅掀起了清朝大规模笺注杜诗的风气,而且《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也几乎渗透到清代诸家杜诗笺注之中。考察清代诗歌诠释史,凡是在内容上被认为具有反映或讽喻社会现实性质的作品都几乎被称为“诗史”,也都差不多用诗史互证方法而被阐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自不必说,连姚文燮注李贺诗时也运用了诗史互证方法,致使清代诗歌笺释走上一条歧途。这就说明,诗史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在理论上也有很大局限。具体说,它只适用于那些借“比兴”传统来表现现实社会或直接叙写与时事有关事物的文学作品。至于大多数抒情性较强的诗歌作品则不能套用这种方法进行解释,否则会导致文学研究误入歧途。清朝人在古典诗歌诠释研究方法上每每步入歧途,即因他们忽略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王夫之在《唐诗评选》卷三中曾经指出:

诗有必有影射而作者,……亦有无为而作者,如右丞《终南山》,非有所为岂可不以此咏终南也?宋人不知比赋,句句为之牵合,乃章淳一派舞文陷人机智。谢客“池塘生春草”是

何等语，亦作以讥刺，睹尽古今人眼孔，除真有眼人迎眸不乱耳。如此作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俗目不知，见其有落叶、日沉、独鹤、昏鸦之语，辄妄臆其有国君危、贤人隐、奸邪盛之意。审尔，则何处更有杜陵也！

王夫之痛斥宋以后的人对诗歌意义的穿凿附会，旨在彰明诗歌的抒情性特质，同时也揭示出古典诗歌解释方法的多样性。

陈寅恪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他自觉熔诸学科于一炉，打通文史界线，为20世纪学术研究方法树立了一种典范。综观陈氏的著述及他在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最成体系的即是诗史互证，这点当受钱谦益的影响，也就是说陈氏的研究方法与《钱注杜诗》密切相关。陈氏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陈氏晚年完成的《柳如是别传》，是他对诗史研究领域的继续和拓展。他以清初钱谦益与柳如是二人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用诗史互证方法分析二人在明末清初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历史事实，使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生动地再现于现代人面前，也使柳如是形象清晰地跃然纸上。这里陈寅恪将钱、柳二人的诗歌也视为“诗史”，因为，在诗歌这种语言文字的深处潜隐了每位诗人对江山易代之际的独特感受。杜甫是如此，钱谦益、柳如是也是如此。

与钱谦益同样，陈寅恪的著述都着眼于用沟通文史的方法进行古代诗歌的笺注和阐释。但陈氏所运用的方法较钱谦益有极大的超越和突破，他在实践的基础上还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体系。陈寅恪指出对古人的学说要具了解之同情，这样才不致于犯穿凿附

会的错误。陈寅恪之所以能避免穿凿附会,是因为他已将其学术研究纳入了科学轨道。

陈氏学术方法的科学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充分占有资料,并且用审慎、精严的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决定取舍。第二,以实事求是的著述态度对待研究工作。第三,在学术研究中强调新方法的运用,这使陈寅恪的学术体现出现代学术的特点。陈氏将西方的比较语言研究法渗透到其传统诗史研究领域。具体地说他对元、白诗的研究大量运用比较分析之法,尤其是在《新乐府》的研究中,将元、白二人的作品逐一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发现二人创作之旨趣、背景、投入的感情每有不同,情况时而有异,以及二人诗歌的特色与水平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而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总之,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继承了《钱注杜诗》,但又有很大的开拓,他将现代学术理论运用于传统文史研究之中,可以说,陈寅恪使传统的诗史互证的诗歌诠释方法增加了新的学术意义,并由此影响到现代学术的发展走向。受陈寅恪学术领域和方法的启发,现代甚至当代学者都表现出对这一方法的浓厚兴趣,纷纷运用这种传统方法进行沟通文史的学术尝试,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足以说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实际意义。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钱注杜诗》也以引书繁富而著称于世,所引关于中唐史实的笔记小说和杂史等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特别是关于唐代地理、职官方面的考辨更为人称道。钱谦益不仅在注释典故、用词上下功夫,而且在笺释诗意及史实时也大量引经据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引用的文献中有大量的古籍已经散佚不存,于此可见《钱注杜诗》一书文献价值。

关于《钱注杜诗》以及它的方法问题,学术界也曾有文章涉及,但尚缺乏全面、系统地讨论和研究。《钱注杜诗》作为一部体现诗

史互证方法的诗歌阐释学著作,它是如何从立意到完成的?它的笺注特点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钱谦益作为《钱注杜诗》的作者,他持何种著述态度?诗史互证传统是如何产生、演变和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及其价值如何?《钱注杜诗》笺释方法对现代学术之影响如何?另外还有《钱注杜诗》的文献价值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本书就以上几个方面拟从方法论的角度分别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试图获得对《钱注杜诗》一书的正确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钱注杜诗》研究,对传统诗史互证方法进行一次检讨,并寻求这种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有人认为诗史互证作为一种古老的治学传统,它只能适合过去,而不能适用于当代学术研究。本书试图通过考察陈寅恪以及当代学者对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过程,揭示这种方法的本质,说明它的内在生命,从而显示诗史互证传统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本书考、论结合,力求从基本材料入手,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但在具体写作中,错误、遗漏在所难免,今以此粗疏之论就教于大方之家。

郝润华

2000年8月8日于兰州

目 录

序	周勋初
前 言	(1)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古典诗歌诠释方法的历史发展	(1)
(一)从经疏到诗注方法的嬗变	(1)
(二)以杜诗笺释为主的宋代诗歌诠释学	(5)
(三)明清时代的诗歌诠释与诗史互证方法 的确立	(14)
第二节 《钱注杜诗》产生的时代政治背景与学术思潮 ..	(21)
(一)“天崩地解”的时代政治背景	(21)
(二)“返经汲古”的时代学术思潮	(25)
第二章 《钱注杜诗》的产生与钱谦益的著述态度	(32)
第一节 “以诗证史”与“冀少存杜陵面目”	(33)
(一)注杜动机——“借诗以存史”	(33)
(二)注杜目的——还原杜诗面目	(45)
第二节 《钱注杜诗》的产生过程与两种诠释方法的分歧	(53)
(一)《钱注杜诗》撰写经过	(54)